

錢載年譜

潘中華著



錢載研究 · 生平卷

主編

楊崇和 范景中

# 錢載年譜

潘中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錢載年譜 / 潘中華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2

(錢載研究·生平卷)

ISBN 978-7-5325-7097-3

I. ①錢… II. ①潘… III. ①錢載(1708~1793)—  
年譜 IV. ①K8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45437 號

楓江書屋策劃

錢載研究·生平卷

楊崇和 范景中 主編

錢載年譜

潘中華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31 插頁 8 字數 602,000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200

ISBN 978-7-5325-7097-3

K·1817 定價: 13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ISBN 978-7-5325-70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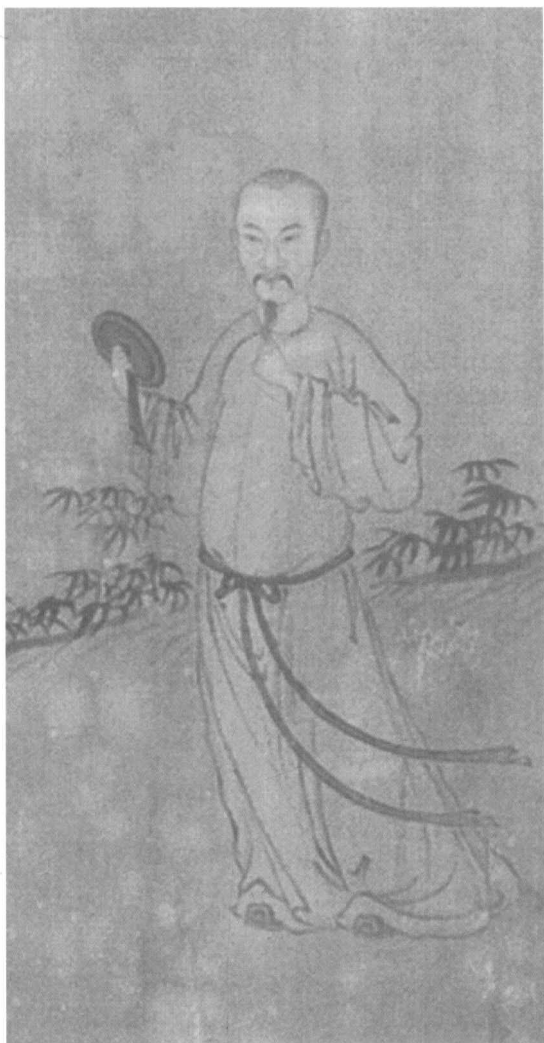
9 787532 570973 >

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資助項目

錢載年譜

白謙慎題





清佚名《蘅石先生畫像》(局部),清張庚補圖,絹本設色,約1736年,嘉興博物館藏。



清佚名《錢擇石先生小像》，佚名摹本，有褚德彝1938年題名，金箋設色，年代不詳，嘉興博物館藏。

《葦石齋詩集》五十卷書影，上海圖書館藏。

葦石齋詩集卷第一

丁巳

太液池曉望

春生暖城市日出麗臺沼從容橋上經遊息羨魚鳥溼柳金  
霧披融冰玉煙渺蓬萊滄海起河漢紫垣遠復旦近  
帝光歌衢徹天表

古琴

歲久紋斯斷材良尾不焦彈非無汲郡製或自雷霄木落高  
山石天空大海潮以之橫膝坐詎獨萬情趨

雪夜

霰粒晚如米飄瞥遂無聲  
燈囧初更街柝沈三更洋洋竟

元

秀水錢載坤

元

葦石齋文集卷第一

秀水錢載坤

翰林院恭撰文

獻俘告祭

社稷壇文

維

天維

祖

宗集命予一人綏和萬邦宜德之文輯甯萬邦宜德之武自  
夫伊犁大定暨于回部悉臣乃有逆酋小和卓木霍集占兄  
弟者負我深恩肆為狂悖爰申  
天討用協人心茲將軍兆惠富德等疊報捷音克平二逆其

《葦石齋文集》二十六卷書影，上海圖書館藏。





《秀石叢竹圖軸》，紙本墨筆，1789年，楓江書屋藏。

范景中評曰：“錢蔣石深得柯九思真意……以水墨寫細篔風神，疏風淡日中有種幾欲畫出色彩的感覺，令人恍對滿溪淺碧，半空殘紅。宋庠《致政張郎中惠親畫墨竹二幀，以詩為報》云‘俗眼莫驚無麗藻，歲寒顏色抵瓊瑰’，可移為此幅題咏。”（《中華竹韻》頁三三八）

## 《錢載研究》序

在研究近三百年的中國歷史時，學界對於明清易代的十七世紀和外患叢生的十九世紀頗感興趣，而十八世紀的康、雍、乾盛世則往往被認為缺乏國家危機和現代化的變革動力而顯得平淡。但當代學者的許多專著從不同視角揭示了這一時期的豐富和活躍，如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及《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沈津《翁方綱年譜》，羅威廉《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的精英意識》以及韓書瑞、羅友枝《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等等。這些著作廣泛涉及十八世紀的學術、社會和文化史，而本著《錢載研究》的編撰動機也是希望加入這股研究潮流，通過對錢氏生平和藝術成就的個案分析，管窺十八世紀中國文化史之一斑。

錢載一生在多方面取得成就。他是乾隆時期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官員，多次主持中央和地方考試，為朝廷選拔了衆多人材，他曾為乾隆帝講解儒家經典，並出任皇子們的老師。作為學者，他參與了纂修《續文獻通考》，後來又擔任四庫全書館總閱官。身為“秀水派”的領袖，他無疑是十八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影響一直延續到清末的“同光體”。他又是一位卓越的畫家，不僅清代畫史對他評價頗高，畫作亦被乾隆、嘉慶二帝收藏，錄入《石渠寶笈》。雖然不以書法名世，包世臣的《藝舟雙楫》仍將他列為清代九十一位有影響的書家之一，作品與王時敏、朱彝尊、石濤和伊秉綬等人的書法同歸在“逸品”。他在四庫館時和戴震關於考據學的爭論，以及因考證堯陵應在山西平陽而遭乾隆帝的斥責和群臣的圍攻等，均為清代學術史上有名的事件，至今仍是學者們關心和研究的問題。在如此多文化領域取得成就和擁有名望，不僅在他的時代，即便是有清近三百年的文化史中也是屈指可數的。

錢載得壽八十六歲，一生經歷豐富、交游廣闊。他生于浙江嘉興的詩書世家，四十歲前主要在江南渡過，之後寄居北京。由于久困科場，只好以坐館為生，生活可謂落魄，是典型的江南布衣文人。1752年他四十五歲時，纔終於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績考取進士，開始了此後一帆風順的仕途。其間五典鄉試，一任學政，宦跡遍及大江南北，最後官至禮部左侍郎，成為朝廷正二品大員，七十六歲蒙恩以原品致仕，優游林下者又十年。據沈津《翁方綱年譜》，乾嘉時期的重要學者年壽在八十五歲以上者僅有八人，而我們進一步發現，在這八人中一生縱跨康、雍、乾三朝的僅錢載一人。生于1708年，卒于1793年，錢氏的一生幾乎涵蓋整個十八世紀。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為了表達歷史的整體性，將歷史分析分為“事件”、“局勢”和“長時段”三個層次，“事件”雖然最為人所矚目，但它常常是數十年“局勢”變化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錢載漫長的一生不僅見證了十八世紀清朝的許多文化“事件”，也經歷了百年間的“局勢”變動。考慮到以上種種因素，錢載無疑是十八世紀文化史個案研究的理想人選。

《錢載研究》計劃由《生平卷》和《藝術卷》兩卷構成。《生平卷》即《錢載年譜》。年譜是中國史志的傳統體例，其長處在于材料豐富，為分析性的歷史寫作保留大量原始文獻。本譜不預設譜主的身份，即不以詩人、畫家、文臣或學者定義譜主，而是廣搜博采有關錢載的各種史料，意在為《藝術卷》的寫作及對譜主有興趣的其他研究者提供比較全面的基礎史料。惟其如此，雖然在付梓前作者潘中華博士已經做了大量的刪節，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年譜仍然有六十餘萬字。

年譜其實不僅是基礎史料，按照年代編排的大量史料其本身也富有昭示意義，只是現代歷史寫作追求創造性的提問和分析結論，所以年譜帶著一副過時的樣子受到輕視。拋開簡單的進步觀來看，明確提出問題統領史料，與不明確提出問題而羅列史料，這兩種歷史編纂法各有長短。對問題導向的歷史來說，其創造性並不體現在它能提出問題，而在于它所提出的問題的品質——這問題能否擊中要害、直指人心。費正清以“衝擊—回應”說統領中國近代史，擊中一時要害；阿里埃斯寫死亡，直指人心。敏感的歷史學家總是能夠抓住那些最具昭示性的問題發出先聲。

可是“歷史是堅硬的解釋果核，外面裹著史實的果肉”（卡爾《歷史是什麼》）。不論問題導向的歷史多麼成功，時代人心一變，對歷史的訴求就會變，新時代的史學家又會把探照燈轉向歷史的不同方向。這就是為什麼費正清的理論固然傑出，然而現代學者却絕不肯滿足于再用“衝擊—回應”說來解釋中國近代史的原因，他們要提出對這個時代來說更具昭示性的近代史框架。這不是正確與錯誤、先進與落後的問題，結論終將耗

盡它的意義，散落的史料磚塊却靜待新一代人拾起。

與問題導向的歷史相比，年譜雖不提問、不分析，但面對平鋪直敘的史料，我們在當下所感受到的細細碎碎的問題，連同個人和集體的情緒，無時不在與這些史料交流碰撞，因之能夠產生出問題，也因之而能夠感受到一股整體的昭示能力。法國漢學家、《戴名世年譜》的作者戴廷傑說得好：

我們要用比較寬闊的視野和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問題，但我不認為應該由某一理論來指導。更坦然地說，我越來越懷疑搞史學研究需要運用某種理論。這並不是說史學家要放棄理論，但他首先要恢復事情的原狀，甚或還歷史的真相。儘管真相是脆弱的、相對的，但是我相信是存在的。撰寫年譜的這些年讓我認識到堅實的博學工作的益處，並感到這一任務的崇高。（《學鏡：海外學者專訪》）

我們對歷史的觀感不能完全被量化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將年譜作為《錢載研究》基礎的原因。希望讀者可以藉此對歷史的原狀產生一些直覺。

《藝術卷》涉及詩歌和繪畫兩個部分，這也是錢載留下的主要文化遺產。詩歌部分包括錢詩箋注、蘄石齋詩論和研究文章。《蘄石齋詩集》付梓兩百多年來，多次再版和選印，但迄今為止尚未有大規模的箋注，《藝術卷》從《詩集》兩千多首詩中刊選代表性作品二百餘首，進行較為詳細的編年箋釋，並特別注重對“今典”的注解。錢載的詩論散見於他對古人和時人詩作的批評中，我們希望通過對這些批評的整理和出版，讓有興趣的讀者對他的詩學思想有所了解，同時幫助釐清乾嘉時期詩學發展的脈絡。例如，翁方綱的“肌理說”被認為是當時重要的詩學理論之一，其實翁氏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基於錢載的詩學批評。蘄石齋詩自清代以來評論頗多，均以舊體詩話的文體出之，近代學者如錢鍾書和錢仲聯等亦未例外。最早以現代學術的形式對錢詩進行系統研究的是臺灣學者何明穎，他於1980年完成了近十萬言的《蘄石齋詩研究》，此文雖然沒有正式出版，但其中的分析方法卻為後來的研究者所借鑒，是近年來大陸接續問世的數種相關論作的先聲。由於何教授的工作具有開創性並奠定了當代錢詩研究的基礎，我們選用了他的論文作為蘄石齋詩的研究成果。

十八世紀上半葉，揚州畫派興起，它的審美趣味與平民市場頗為貼近。錢載與金農、羅聘均有交往，又數游維揚，但他在繪畫創作上卻取徑不同，自有傳統——蘭竹上溯元代趙氏一門，花卉則取法吳派的小寫意，又將詩書和學養自然地融於畫中，呈現出簡

澹雋雅的格調，與揚州畫派張揚恣意的畫風形成鮮明對照。論者以為“所寫蘭石最為超脫，畫蘭葉縱筆偃仰，神趣橫溢。石用飛白法為之，遒勁流轉，絕無滯機。真能擺脫俗格，另闢町畦，卓然塵埃之外”（秦祖永《桐陰論畫》）。錢載雖然沒有去迎合市場化的趣味，可他的畫作在當時仍然受到收藏家的青睞。例如，1803年也就是在他去世十年之後，琉璃廠多寶齋賣出其一幅梅花大幀，售價竟是原絲銀六兩，買家張大鏞稱“足以見其聲價之重”（《自娛悅齋書畫錄》）。一幅“當代畫”能賣六兩銀子，不禁使人想起鄭燮在揚州的鬻畫潤格，其中的大幅標價也是六兩。錢、鄭二人的畫價在乾嘉時代相類，這是頗有意義的。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板橋的潤格是懸在工商業繁榮的揚州，而蘚石的畫價則出于上層文人雲集的京城，這是否也反映了兩座城市、兩種文化的不同品位和不同取向？事實上，錢載的繪畫歷來為士林推重，錢維城在論及“閑寫”即寫意花卉時，于同時代人中唯獨推崇錢載，而錢泳評其蘭竹“書卷之氣溢于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履園叢話》）。在揚州畫派流行的年代，他們的評論或許別具深意。

《藝術卷》所選的繪畫注重四個方面：蘚石齋不同時期的作品，反映時人雅集和紀事的作品，作為詞臣畫家的進呈作品以及與錢載繪畫有關聯的畫家之作品。研究文章分析了錢載繪畫的風格和品位取向、其作品在畫史上受到的關注和地位，并同時探討了蘚石齋對後世畫家的影響。文章也對錢載繪畫的代筆和作偽問題進行了討論。

乾隆皇帝 1735 年登基，1795 年退位，他統治了中國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我們不妨稱十八世紀為乾隆時代，是學者們所說的 *Pax Sinica*，太平盛世。然而，也有人從世界大格局的角度注意到了這一時段中國知識的落後性和思想的保守性。有鑒于此，如果人們從錢載的個案研究中能夠得到一些資訊和啟迪，從而對中國的十八世紀有更具體、更細微的認識，這也是我們出版《錢載研究》所希望獲得的。

楊崇和 范景中

2014 年秋于海上

# 年譜和藝術史研究(代序)

白謙慎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辟有“人的專史”篇，年譜和傳記為其中的兩章。我在西方研究中國藝術史二十餘年，經常要參考中國學者編撰的年譜。我在研究傅山的過程中，也曾在其他學者編撰的傅山年譜的基礎上，撰寫過長文《傅山年譜補正》。當我用英文發表自己的論文和著作時，按照海外漢學家的慣例，將年譜譯成 biographical chronology，或 chronological biography，如果直譯這兩個英文詞，應為編年傳記。但是，biographical chronology 這詞在西方的語境中，通常類似中國比較簡略的人物年表。西方雖然也有把一個人物的年譜編成一本書規模的，但數量比中國少許多。在中國的史學傳統中，年譜很受重視，編得好的年譜，會被認為是重要的學術成果。年譜的編纂，有簡有繁。作得簡的，或是文獻稀缺，迫不得已；或是資料甚為豐富，編撰者只舉其大略。在近些年的學術風氣下，許多學者取詳盡一路，數十萬字的年譜屢見不鮮。

中國學術重視年譜，和傳統史學注重考證以及歷史文獻的特點有關。年譜的編撰需要很多考證工作。我的美國朋友李慧聞女士(Celia Carrington Riely)研究董其昌，曾慨嘆，中文傳記經常不提供人物的生卒年和活動的具體年份，人們重視獲得科舉功名的日期甚於出生日期。以《明史》卷二八八中的“董其昌傳”為例，此傳沒有董其昌的生卒年，除了提到萬曆十七年成進士外，另僅有四次提到年份，很多活動并未提供具體時間。《傅山全書》收傅山撰寫的傳記十九篇，多數沒有生卒年<sup>①</sup>。董其昌的學生王鏊，是明末

---

<sup>①</sup> 這樣說，不排除在其他的傳記文體(如墓志銘和行狀)中，會記錄傳主的生卒年，而這類傳記失佚不傳的情況。

清初的大畫家，人們過去都是根據乾隆十年的《鎮洋縣志》記載的“康熙丁巳，年八十卒”來推出他生于 1598 年。但我和章暉的研究證明，王鑒生于 1609 年。類似情況太多，“生卒年考”便成為中國傳統史學中的一道風景。當考證積累多了，還可編成專著，如陳垣先生的《釋氏疑年錄》、汪世清先生的《藝苑疑年叢談》。

考訂工作還要延伸到其他文獻中去。文人的詩文集有按年代先後編輯的，但很多并不如此。古代信劄很少有年款，大多僅有日月，有時甚至連日月都沒有。對於藝術史而言，還有大量的藝術作品要處理，很多作品無年款。根據內容考訂無紀年的詩文、信劄、書畫，將之繫年，就成為藝術史學者編撰年譜的一項重要工作。

為藝術家做年譜，在清代有翁方綱的《米海嶽年譜》，到了現代，陳垣先生以史學大家的身份，編撰了《吳漁山年譜》，繪畫大師傅抱石先生編了《石濤上人年譜》。近年來，藝術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藝術家的年譜也越來越多。以書法領域為例，王羲之、顏真卿、趙孟頫、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鐸等皆有年譜。一些藝術史學者還在編纂年譜的同時，撰寫研究專著。譬如說，薛龍春的《王寵年譜》和《雅宜山色——王寵的人生與書法》幾乎同時問世。學術專著講究論述闡發，年譜基本上錄而不述，詳細記錄譜主生平事蹟的點點滴滴，可以保存更多的原始材料，正好和學術論著互補。當一位學者編過年譜後，就會對譜主的生平事蹟了然于心，做其他方面的專門研究自然能左右逢源。

潘中華博士編撰的《錢載年譜》，是一個很有學術意義的選題。錢載是乾隆時期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官員，參與了當時很多重要的文化活動，如主持中央和地方考試，為乾隆帝講經並出任皇子們的老師，參與纂修《續文獻通考》，出任四庫全書館總閱官，主持《四庫全書》的審閱等。他還是卓越的詩人和書畫家，加上高壽，和乾嘉時期的很多重要的文化人物都有交集。通過年譜的編撰，全面地展示他的生平和活動、他和同時代文化人物的交往，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潘中華博士雖為藝術史學者，但是在編撰《錢載年譜》的過程中，對錢載一生參與的各方面的活動予以全面的關注。她廣泛搜集了翁方綱、顧列星、吳應和、錢儀吉等人對《蘅石齋詩集》的點評，以及錢載于《翁覃溪詩》、《樊榭山房詩》等的批語；錢氏家族各種文獻稿抄本，如《[海鹽]錢氏家譜》、《廬江錢氏藝文略》、《嘉興錢氏世藏書畫錄》、《[錢氏]文匯》《文匯補編》；雍乾兩朝檔案、奏摺、實錄、起居注二十餘種；清代人詩文集近二百種；引用清代畫史、著錄、題跋五十餘種；著錄錢載見存和待訪畫作百餘件。資料不可謂不豐富。

在收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潘中華做了很多的考訂工作。如《愛日吟廬書畫別錄》

卷二著錄了一通翁方綱的信劄，并未寫明誰是收信人，潘中華考證出此劄是寫給錢載的，并進一步根據國家圖書館藏錢載批翁方綱詩後所附錢載回信，考證出此信寫于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又如《昭代名人尺牘》卷二一錄錢載致“草廬老前輩大人”尺牘，起首云：“自別老前輩，將五年矣。”潘中華考出“草廬”乃諸錦，并考出他于乾隆十九年甲戌以官贊乞休歸里，由此可知此劄應書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不過二人自乾隆十九年之後，除此書信，再無往來。年譜將此信繫于乾隆十九年六月十八日，錢載與諸錦等會飲一條之後。類似的信劄考證，還有不少，在此不一一列舉。

為錢載的一些無紀年書畫作品繫年和根據作品的上款考證收受者，也成為潘中華編撰《錢載年譜》時所必須做的一項工作。清宮舊藏有數幅錢載進呈乾隆皇帝的畫作，均無年款。潘中華根據《皇清誥授資政大夫尚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恩予原品休致顯考璋石府君行述》，將此數幅畫繫于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乾隆皇帝七十大壽和乾隆四十九年在常州迎鑾兩個年份。楓江書屋藏錢載于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初七日為“東侯年長兄”繪竹菊石圖，《年譜》考出“東侯”是錢載進士同年鄭岱鍾。楓江書屋還藏有錢載于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廿日為“昉林老先生”繪蘭石通景四屏，潘中華考出“昉林”是趙升。此外，對於署款錢載的書畫，也存在一個鑒定真偽的問題。《錢載年譜》能夠幫助我們辨偽。譬如說，日本某藏家藏有傳錢載于成都貢院背臨陳淳花卉卷。題識云：“……今奉使成都，館于貢院，公餘之暇，背寫一通。……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秀水錢載，時年七十三歲。”但是，年譜考出錢載于是年四月廿日方抵成都，此畫的真偽就需要進一步研究了。這些考訂工作，看似細小瑣碎，但積少成多，讓一部年譜堅實可信。

對於年譜的編纂，我主張在資料允許的情況下盡量做得詳盡。過去常有一個重要人物有幾部年譜的情況，原因之一，就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近年來，各種大型叢書、畫冊、金石書畫著錄、拍賣圖錄紛紛問世，檢索手段也更加方便，歷史研究的文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因此，古代人物的年譜編撰應該盡量詳盡，爭取一步到位，後人無須重編，如有少數遺漏和訛誤，僅作補充糾正即可。目前這部《錢載年譜》，已達六十餘萬字，很是詳實。但潘中華為這部年譜所做的工作，遠非目前出版的年譜可以容納。為了控制篇幅，她不得不刪去一些資料。只是有些今天看來不那麼重要的資訊，很可能為其他學者提供新的甚至重要的線索。中國年譜的編撰體例能夠容納瑣碎的材料，一些材料如果因篇幅限制不能編入，很可能被湮沒難再發掘。這也是年譜編撰者在面對取捨時常常要遇到的問題。

但是，對年譜的編撰者來說，細緻地梳理過和譜主相關的資料，不管是否包含進了



年譜之中，這一工作都會為今後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目前潘中華正在展開錢載繪畫的研究，其中即將完成的《錢載的水墨花卉》一文，就利用在編撰《錢載年譜》過程中收集到的材料，對錢氏家族的繪畫傳統做了新的探討。錢載既與董邦達、鄒一桂、錢維城等高官有往來，又熟悉金農、羅聘及厲鶚等活躍在揚州的文人群體。加之本人工詩善畫，通過他來觀察并思考 18 世紀中國繪畫與社會文化，不失為一條很好的研究途徑。潘中華正在進行的乾隆詞臣畫家研究，就是旨在從個案擴展到畫史，更細緻、綜合地解讀 18 世紀中國繪畫。她在研究錢載的藝術方面的新成績是可以期待的。

中國文人士大夫常如錢載那樣，具有綜合性的修養和多方面的成就。所以，許多和藝術相關的歷史人物（如蘇軾）的年譜過去多由其他領域的學者編撰。即使是有些藝術家的年譜，也并非由藝術史學者所作，如《沈周年譜》和《祝允明年譜》都是從事文獻學的學者編撰的。這是其他領域的學者對藝術史的貢獻，也是對我們的督促。近年來，由年輕的藝術史學者編撰的年譜越來越多了，標誌著我們這個領域處理文獻水準的提高。更為可喜的是，他們在編撰年譜的基礎上，努力把帶有藝術史自身特點和關懷的個案研究推向深入。從這個大背景來看《錢載年譜》的出版，真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